

结 束 语

回顾这70多年的人生历程，堪回首也好，不堪回首也罢，都已大江东去，时光不再倒流。当然，往事并不如烟。屈指数来，我5岁前是未曾启蒙的孩童。5岁至10岁，国难当头，迁居乡下，时刻惊恐不安，常“跑日本人”。家父聘家庭教师，拒奴化教育，我未荒废学业，懂得爱祖国。11岁至14岁，国共大动干戈。父亲是铁杆国民党，与之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1949年只身赴台，走上了不归路。我就读初中，后考入农校，可免费吃饭读书。14岁至21岁，3年格物致知学有真，以一技之长，服务社会4年，因“政治不可靠”，被“控制使用”。21岁至25岁，争来难得的高考机会，一考中的。瞬间梦断燕园。在北大、人大戴右帽3年，发配宁夏“西海固”。25岁至38岁，劳动改造，浑浑噩噩十多年，历经惊涛骇浪，命大苟且活。浪迹天涯13载，摘右帽，回沪拜老母。39岁至47岁，讨老婆成家，得三子人丁旺。教书育人。三中全会获“改正”，冤案得湔雪。更喜天佑人助，举家返江淮。47岁至60岁，于《淮阴日报》摇笔杆，未尸位素餐、未以权谋私、未为虎作伥，忧国更忧民。关注民瘼，疾恶如仇。追求民主，崇尚自由。60岁至今，退休养老。60至62岁，京城打工两年，只为稻粱谋。差可告慰者，三子均学有所成。和内子逛互联网，游美利坚，观念大转变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；革故鼎新，刻不容缓。位卑未敢忘忧国，“老骥伏枥志在千里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”，老夫以此自勉。

“做学生的总希望多多了解老师的过去……尤其是像您这样复杂的坎坷的经历，假如我们以后有幸能读到您的自传，那将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。”1982年的5月2日，还在陕西师范大学读书的杨占武同学，在我即将离开宁夏时，写给我的信里提出了他的这个希望。至今已25年。我已垂垂老矣，他也年逾不惑。所好这几年我下了决心，诚惶诚恐，总算完成了这二十余万字的回忆录，可以向我的学生们勉强缴卷了。这当然是不平等的。那时候，要他们缴作业，是不允许超越规定期限的。

在这部回忆录写作过程中，我力求写得朴素一点、平实一点、尽量“白描”、做到理性思考。求真求实。对于书中涉及的事情，人们可以见仁见智。我打破常规，直接引用了一些自己的日记、书信及亲朋、同学和学生的书信或文章，还有班上两次反右批斗会上同学对我批判的发言记录。如果让我唱独角戏，即使我存心要把它如实写好，这部分东西肯定会多少“走样”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这相当的一部分还是集体创作。感谢他们，包括早已离开我们的难友林昭、吕庆仕、伍伯涵、傅家训、江泽纯等。我的老伴为我的写作创造了最好的条件，她承担了繁杂的家务劳动，帮我整理查找资料，使我在精力不济的情况下，无后顾之忧。她又是我的回忆录的第一读者，随时提供修改、补充意见。三个孩子还有大媳妇，也十分关注我的写作，从写作、修改到成书，都出了不少力。

令我庆幸的是，今年元月26日，在美国德州奥斯汀，我收到了史学大师余英时教授的复信。感谢他对我的回忆录写作给予诸多的鼓励，又得到他的允诺，将他的这封信做为本书的《代序》。我注意到，余教授是在他七十七岁寿辰的次日给我写的信。他年事已高，时间对他来说是极其宝贵的。他和我素昧平生，为复我的信，要“快览一遍”二十余万字的书稿，让我实在过意不去。他为什么能这样做，我心里明白。在此，祝愿余英老健康长寿。

整风反右派运动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。那次运动的受难者，

他们之中，当时年龄最大的也有七老八十的，最小的，我记得北大有一位西语系的16岁的女右派。当时，历史系的翦伯赞教授曾在一次报告会上引用列宁的话：“上帝是允许青年人犯错误的。”何况，这么一批忧国忧民的青年人并没过错。这位才16岁的小姑娘也难逃脱政治上的灭顶之灾，可见这种政治运动是残酷无情的，是要吃人的。如今，这五十五万多(另有三百多万一说待证实)受难者中的至少50%以上已驾鹤西去，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了。幸存者之中，能写作的，有责任写下自己的经历，让年轻的一代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的苦难，认识到专制极权统治才是人类最大的灾难，才是万恶之源！历史学者单少杰指出：“我们民族在那段苦难岁月里，已失去许多东西，但不要再失去历史，不要再失去国史，不要再失去家史。我们人文学界现今所面临的一个首要任务，就是如何解读那段历史，如何把我们所经历的深重灾难变成我们所拥有的深厚资源，深厚的人文资源。我们既然经历了苦难，就应对得起苦难。”（单少杰：《研究苦难历史的珍贵资源》）

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了，时不我待，我们的奋斗目标应该是建成一个自由、民主、宪政、法治的均富的社会，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不容再瞎折腾了，她理应尽快进入世界自由民主强国之林！

2004-2006年3月写于中国江苏淮安市寓所；

2006年4月至2007年1月

修改、定稿于美国德州奥斯汀市